

史語所與世界史研究： 從「虜學」到全球史

藍弘岳*

本文主要目的是回顧世界史研究室的相關研究成果，但將回顧的對象上溯到史語所創所時的「虜學」，及其後的相關研究。因為在全球史視野下，帝國與帝國間的競爭、比較，及帝國內部的多元秩序，帝國內與外的思想文化交流等等皆是研究重點。在從此角度而言，中國與其他帝國間競爭相關的歷代邊疆研究皆可視為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因此，本文從傅斯年的「虜學」研究談起，再討論凌純聲等人的西南邊疆民族相關研究、陳寅恪、高去尋、杜正勝等的北亞史研究，及周一良、李光濤等人的東亞史研究。然後，再論及 1990 年代以後石守謙所主導的東亞文化意象主題計畫等。之後，再介紹 1990 年代以後世界史研究室成立的過程，及現今相關成員的研究。最後，再展望未來，指出現在全球史研究似乎已成為一種許多成員皆有興趣的研究方向，正在形成的趨勢。

關鍵詞：史語所 世界史 「虜學」 全球史 東亞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世界史研究室召集人

一・前言

世界史研究室成立於 2003 年。最初的成員有邢義田、蒲慕州、李尚仁、戴麗娟、陳正國和張谷銘等六位。之後，祝平一於 2012 年加入，巫毓荃於 2014 年、梁元禎於 2018 年陸續加入。再之後，藍弘岳於 2019 年、李峙嶸、吳孟軒於 2021 年加入世界史研究室。其間，蒲慕州於 2009 年退休、邢義田於 2017 年退休，祝平一退出。現有李尚仁、戴麗娟、陳正國、張谷銘、巫毓荃、梁元禎、藍弘岳、李峙嶸、吳孟軒等九位成員。

世界史研究室成立之時，主要方向為「由文明論之角度探討歐洲古代及近現代文化史」。¹ 由此可知，剛開始時，主要以歐洲史研究為主。但是若我們將世界史研究的範圍，拓展至包括歷代中國周邊國家，則我們可說在創所之後不久就有世界史相關研究了。因為早期史語所前輩已開始中國邊疆研究（即「虜學」研究）。誠然，中國邊疆研究也屬中國史研究之一環，然邊疆與外國的界線會游移。在內亞陸地方面，西藏、新疆等地本非中國王朝史中的一部分。蒙古帝國的歷史與元朝史相關，部分重疊，但也不同。又如匈奴等西北方遊牧民族也非中國王朝，然密切相關。其次，若我們將東亞史視為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則東亞史必然會與中國邊疆史研究發生關聯。然而，中國東方海疆上的日本大部分時期不向中國皇帝朝貢。就此意義而言，日本非臣服於中國天下秩序之國。其次，向中國朝貢的朝鮮王朝和琉球王國也非中國郡縣，臺灣則在清代之前不屬中國。在中國東邊陸地和海洋上的國家，除臺灣情況特殊外，長期以來大部分時期皆是外國（雖有是否接受冊封與朝貢與否之別）。

在傳統華夷秩序觀念中，歷代中國的邊疆與周邊國家的界線會變，與漢族中國不同的其他文化區域皆可以「夷」視之，從「虜學」角度來研究。另一方面，在近代建構的「中華民族」視野下的民族國家史觀中，過去清帝國多元統治的區域皆可被視為中國史。但在全球史視野下，帝國與帝國間的競爭、比較，及帝國內部的多元秩序，帝國內與外的思想文化交流等等皆是研究重點。在從此角度而言，中國與其他帝國間競爭相關的歷代邊疆研究皆可視為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因此，本文會

¹ 蒲慕州，〈世界史研究室〉，《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頁 106。

從「虜學」研究談起，再討論世界史研究室成立後的研究狀況，然後再展望未來。在展望未來的部分，則會論及全球史研究的問題。

二·史語所與中國邊疆史研究

(一)「虜學」

史語所創所於 1928 年，在剛成立時，傅斯年 (1896-1950) 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發表著名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在該文中，他提出「虜學」一詞，提倡「虜學」研究。已退休的本所研究員陳慶隆 (1939-2022) 寫在〈釋「虜學」〉一文，已指出：所謂「虜學」是針對史籍上的四裔問題而發。²

傅斯年說：

西洋人研究中國或牽連中國的事物，本來沒有很多的成績，因為他們讀中國書不能親切，認中國事實不能嚴辯，所以關於一切文字審求，文籍考訂，史事辨別，等等，在他們永遠一籌莫展。但他們卻有些地方比我們範圍來得寬些。我們中國人多是會解決史籍上的四裔問題的，丁謙君的諸史外國傳考證遠不如沙萬君之譯外國傳，玉連之解大唐西域記，高幾耶之注馬哥博羅遊記，米勒之發讀回紇文書，這都不是中國人現在已經辦到的。凡中國人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在歐洲人卻施格外的注意。說句笑話，假如中國學是漢學，為此學者是漢學家，則西洋人治這些匈奴以來的問題豈不是虜學，治這學者豈不是虜學家嗎？然而也許漢學之發達有些地方正借重虜學呢！³

傅斯年以「說句笑話」的語氣，提及「虜學」，然心情卻是沈重的。因為歐洲人注意到過去中國學者不太注重的中國周邊「四裔」之學。他認為「西洋人作學問不是去讀書，是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範圍，所以這學問才有四方的發展，向上的增高」。⁴

² 陳慶隆，〈釋「虜學」〉，收入《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頁 109。

³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 (1928): 5。

⁴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頁 5。

從歐洲學術發展的角度來說，「虜學」與「漢學」皆屬東方學及 philology。顯然，傅斯年是在其「尋找新材料」的「新史學」方法、理念上注意到歐洲人的東方學。歐洲的東方學包括中國傳統的經史之學，但又有包括過去中國周邊的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的語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即重視比較語言學的面相。這也是所名「歷史語言研究所」中之「語言」一詞的由來。其所謂「語言學」指 philology。⁵ 這一傅斯年的問題意識在兩個層面上，與世界史研究相關。第一，「虜學」與傳統中國王朝史學，及以漢字書寫的經史之學有關，但又超出其範圍，包括中國的邊疆和周邊乃至更遠的世界。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舉列的工作範圍包括比較藝術，西南語、中央亞細亞語等等。⁶ 第二，這一問題意識，是受到歐洲東方學乃至日本東洋學刺激之結果，其背後有欲與之對抗的決心與企圖。

說到日本東洋學，我們也會注意到傅斯年所寫的《東北史綱》。該書招致許多的批評。然王汎森指出：「《東北史綱》是傅斯年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心焦如焚下趕出來的作品，主要是為了說服國聯李頓調查團東北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⁷ 陳槃 (1905-1999) 也說：「這部書用民族學、語言學的眼光和舊籍的史地知識，來證明東北原本是我們中國的郡縣，我們的文化、種族，和這一塊地方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這種史學方法和史識，是最現代的、科學的。但書出版以後，頗受人批評。其實這書的問架、輪廓，非高手不能辦。批評的人從細枝末節著眼，當然不無話可說。但是能批評人的，卻不一定就能搭起這樣的問架，描畫出這樣的輪廓。」⁸ 其實，不管我們從什麼角度理解《東北史綱》，該書無疑是傅斯年本人涉及「四裔問題」的相關著作，並且有與日本東洋學對抗的問題意識。

如上所述，史語所在創所之初，就具世界視野。這是傅斯年與重視本土關懷的顧頡剛不同之處。⁹ 事實上，如王汎森在與談中所言，「史語所一開始創始就關心

⁵ 張谷銘，〈Philology 與史語所：陳寅恪、傅斯年與中國的「東方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7.2 (2016)、藍弘岳，〈「文獻學」與本居宣長研究：從國文學、日本思想史學到中國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4.2 (2023)。

⁶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頁 9-10。

⁷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收入《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501。

⁸ 陳槃，〈懷故恩師傅孟真先生有述〉，收入《謬謬之士——名人筆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筆下的名人》（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9），頁 55-56。錄自《新時代》第 3 卷第 3 期。

⁹ 杜正勝，〈舊傳統與新典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

虜學，所以其實一開始聘的人，包括俞大維其實都是虜學的。」「史語所的第一代人裡面，他們其實在讀書或在做什麼的時候，對於『虜』的部分，不管是中國四域或是其他都非常注意。」¹⁰ 在別處，王汎森也說：「傅斯年、陳寅恪這一代想像歷史時各地域之間每每是聯動的，故隨時注意將中國史放在整個亞洲或歐亞草原的交通來看。傅的讀書筆記中經常將中國史聯繫歐亞草原」。¹¹ 即許多史語所前輩的中國史研究經常將亞洲或歐亞草原的歷史納入視野之中。就此意義來說，許多前輩已在世界視野中探究中國史問題。當然，追本溯源，邊疆史地研究可追至晚清因邊疆危機刺激而興盛的「西北輿地之學」。相較之，傅斯年自身及其他史語所前輩的「虜學」（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乃運用新史學和人類學方法論等等所展開的新學術。接下來，我們再將與「虜學」相關史語所前輩研究分為西南邊疆民族相關研究，及東北亞史研究兩個部分來探討。

（二）西南邊疆民族相關研究

之後，按傅斯年的規劃，陸續有史語所前輩從事邊疆史學方面的研究。首先，凌純聲（1901-1978）注重邊疆研究，後來重心放在西南邊疆。他留下《松花江下游之赫哲族》（1934）、《中國今日之邊疆問題》（1934）等著作，並與芮逸夫（1899-1991）合著《湘西苗族調查報告》（1948）等研究成果。¹² 事實上，凌純聲與芮逸夫在 1930、1940 年代在中國南方和西南邊疆進行各種調查。如王明珂所指出的，芮逸夫在 1940 年代發表了〈中華國族解〉、〈再論中華國族的支派及其分佈〉等著作，他的民族調查與研究目的在於「建構中華國族之內涵，並刻劃其邊緣」，可理解為「科學化中國民族分類、識別的先聲」。¹³

但是後來因政治情勢變化，史語所搬遷到臺灣。再之後 1955 年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成立，並於 1965 年正式設所，凌純聲成為該所的創所所長。民族所成為臺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頁 32。

¹⁰ 參王汎森在「慶祝九十五周年學術研討會」的與談。

¹¹ 郝倖仔，〈訪談（王汎森院士）〉，收入《史語所：新學術的高原》（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24）。感謝王汎森院士提供該稿。

¹² 本文所舉列退休研究員研究業績等，皆據史語所網站所列退休離職研究人員著作目錄。以下同。參見：<https://www1.ihp.sinica.edu.tw/People/RetiredAndResigned>。

¹³ 王明珂，〈尋訪凌純聲、芮逸夫兩先生的足跡：史語所早期中國西南民族調查的回顧〉，收入《古今論衡》18（2008）：31。

藍弘岳

灣人類學研究重鎮，開始展開臺灣南島民族方面的研究。凌純聲在民族所時期，寫出〈古代中國與太平洋區的犬祭〉(1957)、〈中國及東亞的嚼酒文化〉(1957)等論文。其次，芮逸夫和桑秀雲(1934-2002)也依然致力於中國西南邊疆民族研究，芮逸夫著有《唐代南詔與李唐關係之研究序》(1976)、〈苗人考〉(1964)，並且同時關注臺灣原住民方面的研究，發表〈臺灣土著各族劃一命名擬議〉(1952)等相關文章。桑秀雲則著有〈蜀布邛竹傳至大夏路徑的蠡測〉(1969)、〈莊躄入滇考〉(1980)、〈從東夷到南蠻——苗族發展史之一：三苗的起源〉(1997)等論文。如上，史語所搬移來到臺灣之後，關於西南邊疆民族方面的研究，其重心開始往臺灣原住民移動，但依然利用文獻進行與大陸地區西南邊疆民族相關的研究。

(三) 東北亞史研究

其次，在東北亞研究方面，可分為與中國西北方邊疆史學相關的北亞史(內亞史)研究，及以朝鮮和日本為主的東亞史研究。即「西域」與「東海」的差異。葛兆光認為：「西域研究之重心在中古，而東海研究之重心則應在近世。因此，西域研究需要關注『重疊』，而東海研究則需重視『分化』。¹⁴ 從中國史角度來說，對於這兩個區域的研究還是有差異。過去史語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歷史語言學相關的北亞史研究，即西北方遊牧民族和其語言等方面的研究。

在北亞史方面，史語所第一代代表人物陳寅恪(1890-1969)即是這方面的專家。如在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中說：「又《周書》四〈明帝紀〉記明帝宇文毓，『小名統萬突』……『突』字亦取義於胡字 Bargatun。」¹⁵「苻堅為什麼惡聞『苻詔死新城』的童謠」、「『詔』為南詔語，為『王』的意思。苻詔即苻王，指的是苻堅。苻堅聽到『苻詔死新城』感到害怕，可以證明氐人與南詔的語言同出一源。」¹⁶ 如上，陳寅恪多運用比較歷史語言學方法來研究中國史，故他自然會論及許多中國邊疆民族的語言與歷史。¹⁷

¹⁴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272-273。

¹⁵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臺北：雲龍出版社，1995)，頁290。轉引自郝倬仔，〈訪談(王汎森院士)〉。

¹⁶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頁102。轉引自郝倬仔，〈訪談(王汎森院士)〉。

¹⁷ 孔令偉，〈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兼論內亞史及語文學的未來展望〉，《新史學》31.1(2020)：53-102。

此外，與陳寅恪一樣，未隨史語所來臺灣的史語所研究人員中，也有許多「虜學」專家。如著名藏學專家于道泉（1901-1992）在1930年發表《第六代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等。王靜如（1903-1990）則在西夏學領域有卓越成就，從比較語言學方法入手，著有〈西夏文漢藏譯音釋略〉（1930）、〈論阻卜與韃靼〉（1931），並於編著《西夏研究》三輯（1932-1933）。¹⁸ 短暫隨史語所來過臺灣的韓儒林（1903-1983）熟知蒙、藏文，以比較語言學方法研究元史，後來著有《穹廬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1982）。¹⁹ 隋唐史專家岑仲勉（1885-1961）寫過《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1958）、《中外史地考證》（1960）等與北亞史相關的著作。後述的日本史大家周一良（1913-2001）也有〈論宇文周之種族〉（1938）等北亞史方面的論著。²⁰

其後，史語所在臺灣發展的時期，有以下的北亞史研究。首先，李學智（1919-2003）著有〈黑龍江與隋唐兩代之黑水靺鞨〉（1956）、〈肅慎與挹婁之商榷〉（1957）、〈對於勿吉、靺鞨種族與名稱之管見〉（1957）、〈釋女真〉（1958）等等與北方民族稱謂相關的研究。而且，他特別是關注滿文老檔的問題，著有〈東洋文庫日譯本「滿文老檔」未收的幾件老滿文〉（1961）、〈清世祖之滿文即位大赦詔書〉（1964）等論文。管東貴前所長關注滿族文化的問題，著有〈滿族入關前的文化發展對他們後來漢化的影響〉（1968）、〈關於滿族漢化問題的意見的討論〉（1970）等等的論文。陳慶隆同樣關心與清代史相關的北亞史（內亞史）問題。他著有〈和卓考釋〉（1968）、〈撒馬兒罕語源考〉（1969）、“Aksakals in the Meslem Region of Eastern Turkistan”（1975）、〈內亞遊牧民族的船舟〉（1992）等等。

其次，謝劍發表過〈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1969）、〈匈奴宗教信仰及其流變〉（1970）等與匈奴相關的研究。但後來他離開史語所，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從事彝族支系撒梅族及瑤族支系排瑤等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及客家人研究。²¹ 邢義田寫過〈漢武帝伐大宛原因之再檢討〉（1972）、〈東漢的胡兵〉（1973）等漢代中國政權與夷狄關係方面的論文。陶晉生從宋元史的領域出發，也展開與北亞史相關的研

¹⁸ 張道奎，〈西夏學泰斗王靜如的民國歲月——史語所才俊譜（十八）〉，《國學茶座》23（2019）：64-72。

¹⁹ 韓朔眺、陳得芝，〈韓儒林傳〉，《朔漠情思：歷史學家韓儒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3-20。

²⁰ 參王汎森在「慶祝九十五年學術研討會」的與談。

²¹ 唐欣偉，「對謝劍的訪談」，中國學的知識社群研究計畫（<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tw-121.doc>，2009.08.11，08.13，08.26，2010.01.06，2023.06.03 參閱）。

藍弘岳

究。發表過 *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1976)、《女真史論》(1981)、《宋遼關係史研究》(1984)、*Two Sons of Heaven: Studies of Sung-Liao Relations* (1988) 等等。洪金富 (1946-2019) 也從元史角度論及北亞史方面的問題，有“China and the Nomads: Misconceptions 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on Inner Asia”(1981) 等著作。擅長多種語言的卓鴻澤著有“Some Classical Malay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Novel Journey to the West”(2004)、〈塞種源流及李唐氏族問題與老子之瓜葛：漢文佛教文獻所見中、北亞胡族族姓疑案〉(2007)、“The Poetic Forms and Two Longer Poems in the Manju gisun i yobo maktara sarkiyān”(2010) 等等。

另外，本來考古學門的一個方向就是以中原為中心的東亞史前文化與文明研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高去尋 (1909-1991) 寫過〈讀前漢書西域傳札記〉(1935)、〈評漢以前的古鏡之研究並論准式之時代問題〉(1948)、〈李峪出土銅器及其相關之問題〉(1999) 等論文。他在這些論文中，探究古代中國銅器與歐亞草原上文物，特別是「史克泰·西伯利亞」文化間的可能關聯。在其師高去尋的研究基礎上，杜正勝再進一步發展其論，寫出〈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1993)、〈周秦民族文化「戎狄性」的考察——兼論關中出土的「北方式」青銅器〉(1993) 等論文。杜正勝在這些論文中，探討了多文化的北方民族的華夏化，及臨近北方民族的華夏國家之戎狄化這一方面的問題。²²

再者，在北亞史方面，我們當然也必須言及結合史學與人類學方法論的王明珂的研究。他著有《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1997)、《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2003)、《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2009) 等中國邊疆史、北亞史乃至前述西南邊疆方面的著作。這些著作乃引導當代相關研究的重要著作。

在東亞史研究方面，1930 年朱希祖 (1879-1944) 在辭去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後，曾短暫加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但於 1932 年改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史研究所所長。其間，朱希祖發掘《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和《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內閣大庫中之《平定海寇方略》) 等第一手史料，並由史語所出版後，近代中國的鄭成功歷史研究方得以進一步發展。²³ 他先後撰寫〈中國最初

²² 上述論文，感謝杜正勝院士來信告知。

²³ 朱希祖，〈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序〉，楊英，《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北平：中

經營台灣考》等數十篇論文，成為研究南明史的權威。²⁴

此外，周一良也在 1936 到 1937 年間擔任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員，故在此簡論其日本史研究。周一良在燕京大學的畢業論文為《〈大日本史〉之史學》(1935)，後來他論及該文時，說：「即以當時資產階級史學觀點看來，論述也嫌陳腐」。²⁵ 然平實而論，相較於其在 1949 年後寫的日本史相關文章，該文內容紮實，可見其青年時期的史學功力。1949 年後寫的文章有從馬克思主義觀點論述的明治維新論，及許多關於中日交流史的文章。特別是其有關中日交流史方面的研究應在相當程度引領了中國大陸的日本史研究。²⁶ 其中，筆者覺得最有趣的是〈扶桑四周〉一文，該文記錄了 1985 年他到日本訪問的相關見聞及與日本學者的交流，可略窺 1980 年代中日學界間交流的樣貌。

其次，受日本東洋史學啓發，1930 年代金毓黻 (1887-1962)、孟森 (1868-1938) 等明清史研究者開始使用《朝鮮王朝實錄》進行研究，晚他們一個世代在史語所工作的李光濤 (1902-1984) 注意到《朝鮮王朝實錄》。²⁷ 李光濤是極少數長期待在史語所並從事過東亞史研究的前輩。他以整理「明清檔案」而聞名，但也發表了《萬曆二十三年封日本國王豐臣秀吉考》(1967)、《中韓民族與文化》(1968)、《朝鮮「壬辰倭禍」研究》(1972)、《記明季朝鮮之「丁卯虜禍」與「丙子虜禍」》(1972) 等等明清時期的中韓、中日交流史相關研究。李光濤在《中韓民族與文化》中，表明他撰述此書目的之一是據傅斯年提出的重視「第一等之原料」的想法，主要據少人利用的《朝鮮實錄》(《朝鮮王朝實錄》) 及「明清檔案」進行研究。²⁸ 另一目的則是：「闡揚中韓千年來同文同種以及所謂『中韓唇齒』彼此相因相藉的史事」。²⁹ 李光濤的研究大量據一手史料再加以個人陳述書寫而成。在今日看來，其論或有許多不足之處，然其研究無疑引領後來的東亞交流史。值得一提的是，後來成為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的張存武在李光濤的指導下也使用《朝鮮王朝實錄》進行中韓關係史方面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1），頁 26。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

²⁴ 王愛衛，《朱希祖史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頁 133-163。

²⁵ 周一良，〈扶桑四周〉，收入《周一良全集 4》（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頁 304。

²⁶ 湯重南，〈周一良教授與日本史研究〉，收入《周一良全集 5》（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頁 561-565。

²⁷ 吳政緯，〈「朝鮮」如何進入明清史家的視界〉，《明代研究》33 (2019)：167-182。

²⁸ 李光濤，〈序〉，《中韓民族與文化》（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8），頁 1。

²⁹ 李光濤，〈序〉，《中韓民族與文化》，頁 2。

藍弘岳

的研究。張存武後成為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的理事長，並出版《清韓宗藩貿易》(1978)、《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1987)等著作。³⁰

其次，未隨史語所遷臺的王崇武(1911-1957)也注意到並使用《朝鮮王朝實錄》進行明史研究，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讀明史朝鮮傳〉(1947)、〈李如松征東考〉(1947)等論文。³¹其他在中韓交流史方面，後來如黃清連發表過〈從《扶餘隆墓誌》看唐代中韓關係〉(1992)，黃寬重也發表過〈宋代中韓文物的交流〉(1991)等等屬相關研究。

其次，在中日乃至東亞交流史方面，許多史語所前輩有相關業績。如梁其姿“Japanese Medical Texts in Chinese on Kakké in the Tokugawa and Early Meiji Periods”(2015)、杜正勝〈從醫療史看道家對日本古代文化的影響〉(1993)、石守謙《移動的桃花源：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2012)、王汎森〈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為例〉(1998)、李貞德〈從域外看中國：醫心方及其婦科醫學論述〉(2015)、陳國棟《東亞海域一千年》(2005)等。陳弱水從其對臺灣社會與中國思想史問題的關心出發，寫過〈日本近代思潮與教育中的社會倫理問題——一個初步的考察〉(2000)等論文。³²

其次，對筆者而言特別需要一提的是，石守謙所主導的東亞文化意象主題計畫。該系列計畫至今持續進行，筆者也參與其中。現已出版《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2011)、《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2015)、《共相與殊相：東亞文化意象的轉接與異變》(2018)等著作。該系列計畫可說引領近二十年來的東亞藝術、文學等的交流史研究。本所成員林聖智也參與其中，寫過〈八仙的變身：狩野山雪《群仙圖襖》的相關問題〉(2016)、〈京狩野與江戶儒者——以狩野山雪的聖賢圖為例〉(2020)等與東亞藝術史相關的論文。

此外，曾任職於史語所的許倬雲在1990年代後也有如：〈中國古代文化與其他古代文化的比較(1)——西周與兩河篇〉(1993)、〈中國古代文化與其他古代文化的比較(2)——埃及篇〉(1994)、〈古希臘文化與中國古代文化的比較〉(1994)、〈中國史與世界史的結合〉(1995)、《我者，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2009)

³⁰ 吳政緯，〈「朝鮮」如何進入明清史家的視界〉，頁185-187。

³¹ 吳政緯，〈「朝鮮」如何進入明清史家的視界〉，頁184。

³² 這些論文收在《公共意識與中國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及其修訂版《公義觀念與中國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等著作中。

等等與東亞史乃至世界史相關的論著。

如上所述，我們可看出與「虜學」相關的東北史研究主要從人類學乃至歷史語言學的角度進行，且主要是表現為一種邊疆史研究，皆或多或少帶有某種中國民族主義的情懷，以探究邊疆區域，中國之政治與文化影響為其問題意識。但約莫在 1990 年代以後的東亞史相關研究主要是中國與外國間的交流史研究，關心中國思想、文化與其周邊國家（特別是日本與韓國）的思想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問題。並且在上述一些研究也有世界史的視野。這些研究之後，陸續有史學界後進從醫學史、藝術史、思想史、海洋史的視角展開相關研究。正是在這的背景下，世界史研究室於二十一世紀初期誕生。

三·世界史研究室的成立與其研究

1990 年代以後，隨著中華民國的解嚴、民主化，在臺灣歷史學界，除臺灣史研究有顯著發展之外，前述與中國史相關的東亞思想文化交流史也開始受到關注。與本文主題相關的是，同時有志於世界史研究的學生、學者也開始增加。2001、2002、2003 年由時任國科會人文處處長的王汎森主辦，在其支持下，臺大與史語所舉行世界史相關的研習營，夏伯嘉（2000 年當選院士）也參與。在夏伯嘉等人的幫助下，史語所陸續聘進從非中國史專業的戴麗娟、陳正國、張谷銘。後在陳弱水等人努力下，2003 年世界史研究室正式成立。³³ 在這一時代脈絡中，也於 2008 年成立「臺灣世界史討論會」（World History Taiwan Group，簡稱 Clio Taiwan）。³⁴

世界史研究室正式成立不久後，邢義田說：

史語所最新的「變」莫若成立不過年餘的世界史研究室。成員全是留美留歐派，目前研究的內容是傅斯年所謂的「虜學」，甚至超出了虜學的範圍，與中國幾乎無關。他們將為史語所帶來什麼變化，猶待觀察。³⁵

邢義田也從與「虜學」關聯的角度理解史語所世界史研究的發展，並認為世界史同

³³ 這段文字來自 2023 年 10 月 17 日筆者對戴麗娟進行的簡短訪談，及王汎森的與談。

³⁴ 楊肅獻，〈世界史研究在臺灣的論壇：「臺灣世界史學術發表會計畫」紀要〉，收入《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3.4 (2012)：123-125。

³⁵ 邢義田：〈變與不變：一個史語所歷史學徒的省思〉，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頁 155。

藍弘岳

仁的研究已超出「虜學」範圍。誠然，世界史研究室成員的研究已包括了當初傅斯年欲與之對抗的歐洲本地的歷史。以下分別簡單介紹世界史研究室成立以來，各個成員的研究。

（一）歐洲古代與中國

首先，邢義田著有《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2011)、《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2011)、《立體的歷史：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2014) 等著作。邢義田是臺灣秦漢史研究的權威。如上列書名，他使用簡牘和圖像等進行相關研究。與世界史研究相關的是，邢義田在探究秦漢史時，也會關心秦漢時期中國與羅馬帝國的關係等方面的問題。而且，邢義田熟知古代西洋史，也寫過如〈羅馬帝國禁衛軍、地方軍團和一世紀後期至三世紀的皇位繼承〉(2004) 等論文。

其次，蒲慕州是古代中國宗教史專家，著有《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宗教之省思》(1993)、*In Search of Personal Welfare: A View of Ancient Chinese Religion* (1998)、*Enemies of Civilization: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ers in Ancient Mesopotamia, Egypt, and China* (2005)、*Ghosts and Religious Life in Early China* (2022) 等中、英文方面的著作。他在這些著作中，主要利用傳統文獻及新出土材料，討論中國人死後世界觀等問題。另一方面，與世界史研究相關的是，在上述著作中，蒲慕州從比較古代史、比較文明史等比較的角度展開古代中國宗教史研究。他認為「比較本來是一切知識的來源。所有的知識基本上是比較的結果」，重視從比較的角度來解析中國古代宗教文明。³⁶ 與此相關，蒲慕州也是臺灣學界少有的埃及學專家，著有《法老的國度：古埃及文化史》(2001) 等著作。在西洋史方面，也出版過《西洋上古文化：探索與反思》(2009) 等著作。

（二）近現代西方知識與臺灣、中國乃至東亞

近二、三十年來，在杜正勝等人的帶領下，醫療史一直是許多史語所同仁關心並參與的領域。世界史研究室同仁李尚仁和巫毓荃皆留學英國，於倫敦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並主要從近代西方醫學在中國、臺灣的發展著手，展開相關研究。首先，李尚仁關心英國熱帶醫學史與中國傳教醫療史等相關的問題。他著有《帝國的醫

³⁶ 李華，〈不確定時代的安頓：與蒲慕州教授一席談〉，灼見名家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2023.01.15，2023.06.02 參閱)。

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2012) 等專書，及〈氣候、節制與健康：韓雅各論歐洲人在上海的衛生之道〉(2018)、〈帝國、殖民與西方醫學〉(2017) 等論文。³⁷

相較之下，巫毓荃則致力於東亞的精神醫學、心理學與心理治療史方面的研究，目前則聚焦於二十世紀初日本的心理治療。他發表過〈氣候、體質與鄉愁：殖民晚期在台日人的熱帶神經衰弱〉(2008)、〈專業、國家、美援與民間社會：1945-1970 年台灣的精神醫療〉(2022)，及“A Disorder of Qi: Breathing Exercise as a Cure for Neurasthenia in Japan, 1900-1945” (2016) 等中、英文論文。

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取得博士學位的祝平一也從事醫學史方面的研究，但他的研究範圍也包括曆算學等，重視十七、八世紀中國在身體與自然方面的知識與西學的關聯。他著有《說地：中國人認識大地形狀的故事》(2003)、〈身體、靈魂與天主：明末清初西學中的人體知識〉(1996)、“Remembering Our Grand Tradition: Chourenzhuan and the Scientif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1600-1800” (2003)、〈方寸之間：天主教與清代的心、腦之爭〉(2016) 等專書與論文。

其次，戴麗娟在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取得博士學位，研究領域為與人類學相關的十九、二十世紀法國史。之後，她把博物館放在整個法國人類學建制化的過程中來討論，並從中西交流史角度，探究博物館與近代中國歷史的關聯等問題。已出版的作品包括法文專書 *L'anthropologie française entre sciences coloniales et décolonisation (1880-1960)* (2011)，及〈法國人類學的博物館時代——兼論人類學物件之特性及實證人類學之建立〉(2006)、〈從徐家匯博物院到震旦博物院——法國耶穌會士在近代中國的自然史研究活動〉(2013)、〈十九世紀初澳門不列顛博物館的歷史意義：兼論英、印、中自然史資訊流通網絡的運作〉(2020) 等論文。

陳正國則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主要的研究興趣是十八世紀英國思想史，尤其是蘇格蘭啟蒙思想。近年的研究觸角則延伸到歐洲啟蒙思想在東亞，尤其是在中國的繼受與再現。他著有〈從利他到自律：哈其森與史密斯經濟思想間的轉折〉(2004)、“The British View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Class Consciousness” (2004)、〈從專制到東方專制：十八世紀英國殖民進程與東方專制論起源〉(2017)、〈亞當史密斯的帝國論述及其背景〉(2020) 等中、英文的論文。

³⁷ 以下關於世界史研究室成員的研究領域和著作，參閱史語所網站上的「研究自述」和「著作目錄」。

藍弘岳

張谷銘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最先致力於歐洲近代早期的科學與醫學，後來則將研究範圍擴展到高等教育的全球史、philology 的比較歷史等。他對於 philology 這一門近代西方的學術如何在中國發展，及其與史語所的關係等有精彩的研究。他已出版 “Motus Tonicus: Georg Ernst Stahl’s Formulation of Tonic Motion and Early Modern Medical Thought” (2004)、〈Philology 與史語所：陳寅恪、傅斯年與中國的「東方學」〉(2016)、“For the Love of the Truth: The Dissertation as a Genre of Scholarly Public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021) 等中、英文的論文。

梁元禎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主要從事地中海歷史研究，關注西班牙帝國，基督徒、穆斯林與猶太教徒間的關係，以及前近代伊斯蘭社會。他曾出版專書 *Family and Empire: The Fernández de Córdoba and the Spanish Realm* (2011)，及 “Hidden Subjectivities in Objective Measures: Spanish Perceptions of Geographic Space in North Africa” (2020)、“Spanish North African Enclaves and Urban Networks in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in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2021) 等論文。

吳孟軒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博士學位。他的研究興趣在世界史、宗教史、醫療史，本來的研究重心在歐洲的傳教史，近年來擴展到醫學的跨國史，及全球史相關的研究。他出版了 *From Christ to Confucius: German Missionaries, Chinese Christians,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1860-1950* (2016) 專書，及 “Superstition and Statecraft in Late Qing China: Towards a Global History” (2022) 等論文。

李峙嶸在英國劍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他現在的研究方向是檢視二十世紀上半葉英國社會對於唯心論思想的討論與實踐，進而為該思想典範之興衰提供一個更系統性的解釋。其次，他也著手考察二十世紀上半葉英美進步派思想家對於中國社會與倫理的關注與討論，以及這些探索對於英美主流社會思想的影響。他已發表 “Idealism,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Revisiting the Oxford Report of 1908” (2021)、“The New Liberals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Idealist Philosophy, Evolutionary Sociology, and the Quest for a Humanitarian Ethics in Edwardian Britain” (2023) 等論文。

(三) 東亞思想文化交流史

藍弘岳在東京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他在博士論文期間，主要以荻生徂徠為主，

研究十七、十八世紀日本的江戶儒學史。回臺就職後，將重心放在十九世紀日本思想史，探究後期水戶學、幕末的昌平黌儒學等方面的議題，及日本思想文化與東亞諸國間之思想連鎖現象等問題。他的代表研究成果是《漢文圈における荻生徂徠：醫學・兵學・儒學》(2017)，並發表過〈會澤正志齋の歴史敘述及其思想〉(2018)、〈明治日本の「自由帝國主義」與臺灣統治論：從福澤諭吉到竹越與三郎〉(2020)、〈「帝國」概念在漢文圈的翻譯與流傳：從幕末日本到清末中國〉(2022) 等論文。

綜上所述，在這二十年來的世界史研究室發展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世界史研究，從與「虜學」相關但又超越其範圍的歐洲古代與中國的關係史、比較研究開始發展。後來，陸續進所的成員皆從事於近現代歐洲史研究，及近現代歐洲知識與東亞（主要是中國）間的思想、文化間的交流與關聯等方面的研究。最後，也有專門從事於東亞思想文化史的成員加入，但藍弘岳其實也相當關注近現代西方知識與東亞間的交流等問題。故這可謂是現今世界史研究室的主流。

其次，此時各個成員所從事的歐洲史和東亞史研究皆已不再是「虜學」問題意識下的研究，但應皆與全球史的研究相關。關於全球史，有著許多不同的詮釋。但大抵皆將整個地球視為一個密切關聯的世界，重視全球規模的經濟活動、戰爭、疾病與環境等方面的問題，並注重人物、文本、事件和觀念的交流、聯結、比較等，從而批評民族國家史觀和歐洲中心史觀等。³⁸ 上述世界史研究室同仁的研究皆可謂某種全球史研究。特別是，最近幾年進所的世界史同仁，如李峙嶽、吳孟軒和藍弘岳等人都對全球史（全球思想史）感興趣。2023 年吳孟軒就特別邀請了全球史研究的大家 Sebastian Conrad 來臺進行幾場演講。藍弘岳邀請來的慶應大學教授大久保健晴也進行了與全球史相關的講演。就這一意義而言，或許我們可說，在近百年來的史語所世界史研究已從「虜學」走向全球史。

但話又說回來，筆者並非獨斷主張今後世界史研究室應往全球史的方向發展，而是認為這應是一個正在形成的趨勢。這一趨勢對於世界史研究室中的歐洲史專業和東亞史專業的相互溝通等等應有相當正面的意義。

³⁸ 成田龍一、長谷川貴彥編，《〈世界史〉をいかに語るか：グローバル時代の歴史像》（東京：岩波書店，2020）。

四·展望未來

如上所述，史語所的世界史研究已發展超過二十年以上的時間。特別在這幾年有急速的成長。但是若更進一步展望的話，筆者覺得有以下幾個領域可再拓展。首先，古代中國史與古代西洋史的關聯及比較本是世界史研究重視的一個研究方向，但邢義田、蒲慕州兩位前輩退休後，目前世界史研究室尚欠缺這一方面的人材。再者，韓國史及與華僑研究相關的東南亞史，乃至中東史、美洲史等等皆是今後世界史研究室可拓展的研究領域，希望今後能招募這方面的人材。

實際上，世界史的涵蓋範圍相當廣泛，要如何將大家聚集在一起進行共同研究，並非易事。因此，在過去兩年，我們特別請世界史研究室對自己的研究主題、興趣等進行報告，以便大家更了解彼此的研究。這一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現在，就既有成員如何一起進行世界史研究的問題而言，目前有以下兩個計畫中的方向：(1)「帝國與知識」相關構想與計畫，(2)「史語所與世界漢學」相關構想與計畫。

先說明「帝國與知識」相關構想與計畫。這一計畫是由陳正國提出的構想。目前已針對這一主題進行過三次的讀書會。在三次讀書會中，參與的世界史成員除陳正國外，尚有藍弘岳、吳孟軒、李峙暉、李尚仁、巫毓荃，及其他非世界史研究室的人員。在這三次讀書會中，大家從多元性、天下、中央、邊界、內外等角度針對帝國與知識這一主題進行熱烈的討論。世界史研究室的一個特色是，大家的研究領域與對象差距相當大。「帝國與知識」應是大家皆能找到與自己的研究領域相關切入點的主題。若無意外，這將是今後世界史研究室會進行的研究方向之一。

其次，「史語所與世界漢學」這一計畫構想是由戴麗娟提出的。當初提出的問題意識主要是配合史語所一百周年所慶，舉辦相關研討會。其構想主要是探究在這將近百年時間，特別是創所之後的二、三十年間，史語所相關人員與其他世界漢學（中國學）研究間的交流、論爭等問題。目前除戴麗娟外，藍弘岳、吳孟軒、李峙暉和張谷銘皆表示有興趣。特別是，藍弘岳擬針對史語所與日本漢學這一主題進行相關研究。

上述兩個主題，都與全球史乃至全球思想史等熱門研究取向有關。不管從哪一個主題來進行相關研究，筆者以為今後我們也可朝與其他從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學術機構進行相關的交流與合作。這應也是今後世界史研究可從事的工作之一。

無庸置疑，史語所是從中國史研究起家的。今後，這依然會是重中之重。但或

許今後我們更需從周邊乃至全球來看中國。再換個角度說，其實對如筆者這種非日語母語者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者來說，最難的是如何從中心看日本。因此，筆者的自我期許是，從中心看日本、再從日本看臺灣、中國與世界、然後再從世界回望日本、臺灣、中國。

最後，與上述自我期許和臺灣的歷史教育等問題相關，世界史在臺灣已發展許久，世界史研究室也成立二十餘年，筆者認為我們或有必要思考一種臺灣觀點的世界史論述。這是今後史語所世界史研究室同仁們可共同思考的問題。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朱希祖，〈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序〉，收於楊英撰，《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1，據舊鈔本影印。
-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據清內閣大庫原藏稿本校印。

二·近人論著

孔令偉

- 2020 〈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兼論內亞史及語文學的未來展望〉，《新史學》31.1：53-102。

王汎森

- 2003 〈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收入《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489-516。

王明珂

- 2008 〈尋訪凌純聲、芮逸夫兩先生的足跡：史語所早期中國西南民族調查的回顧〉，《古今論衡》18：17-32。

王愛衛

- 2018 《朱希祖史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吳政緯

- 2019 〈「朝鮮」如何進入明清史家的視界〉，《明代研究》33：167-182。

李光濤

- 1968 《中韓民族與文化》，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杜正勝

- 2004 〈舊傳統與新典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15-41。

邢義田

- 2004 〈變與不變：一個史語所歷史學徒的省思〉，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141-160。

- 周一良
2015 〈扶桑四周〉，收入《周一良全集 4》，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頁 302-319。
- 郝倬仔
2024 《史語所：新學術的高原》，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 張谷銘
2016 〈Philology 與史語所：陳寅恪、傅斯年與中國的「東方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7.2：375-460。
- 張道奎
2019 〈西夏學泰斗王靜如的民國歲月——史語所才俊譜（十八）〉，《國學茶座》23：64-72。
- 陳寅恪
1995 《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臺北：雲龍出版社。
- 陳槃
1999 〈懷故恩師傅孟真先生有述〉，收入《諤諤之士——名人筆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筆下的名人》，上海：東方出版中心，頁 54-57。
- 陳慶隆
2000 〈釋「虜學」〉，收入《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109-124。
- 傅斯年
1928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3-10。
- 湯重南
2015 〈周一良教授與日本史研究〉，收入《周一良全集 5》，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頁 555-573。
- 楊肅猷
2012 〈世界史研究在臺灣的論壇：「臺灣世界史學術發表會計畫」紀要〉，收入《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3.4：123-125。

藍弘岳

葛兆光

2011 《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蒲慕州

2008 〈世界史研究室〉，《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106。

藍弘岳

2023 〈「文獻學」與本居宣長研究：從國文學、日本思想史學到中國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4.2：429-477。

韓朔眺、陳得芝

2000 〈韓儒林傳〉，《朔漠情思：歷史學家韓儒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頁 3-20。

成田龍一、長谷川貴彥編

2020 《〈世界史〉をいかに語るか：グローバル時代の歴史像》，東京：岩波書店。

三・網路資訊

李華

2023 〈不確定時代的安頓：與蒲慕州教授一席談〉，灼見名家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2023.01.15)，2023.06.02 參閱。

唐欣偉

2009 「對謝劍的訪談」，中國學的知識社群研究計畫 (<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tw-121.doc>，2009.08.11, 08.13, 08.26, 2010.01.06)，2023.06.03 參閱。